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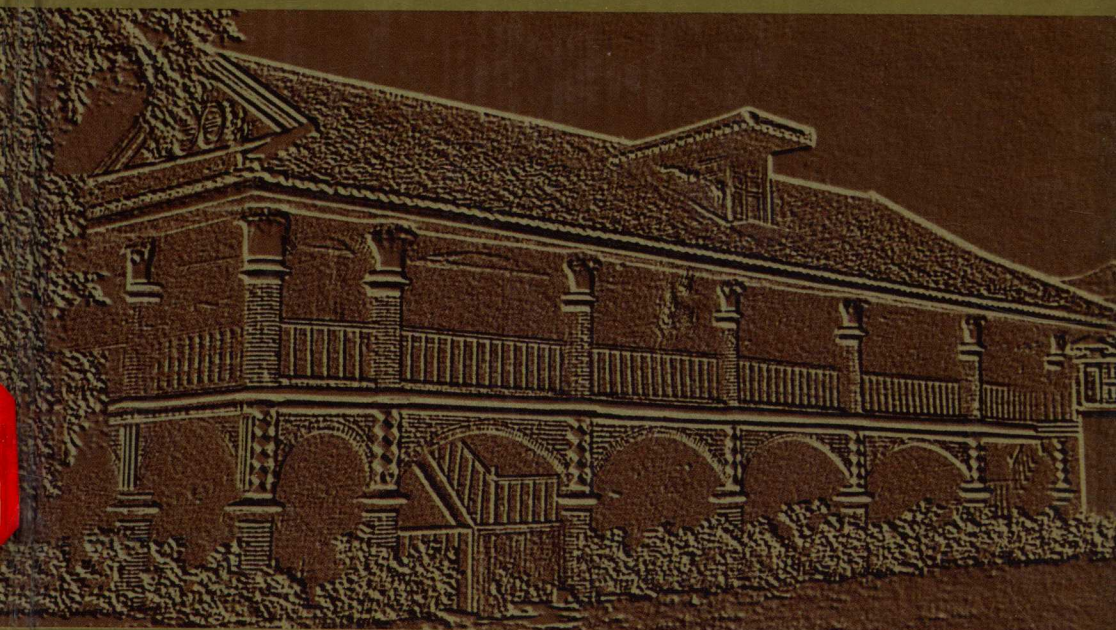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27—1936

②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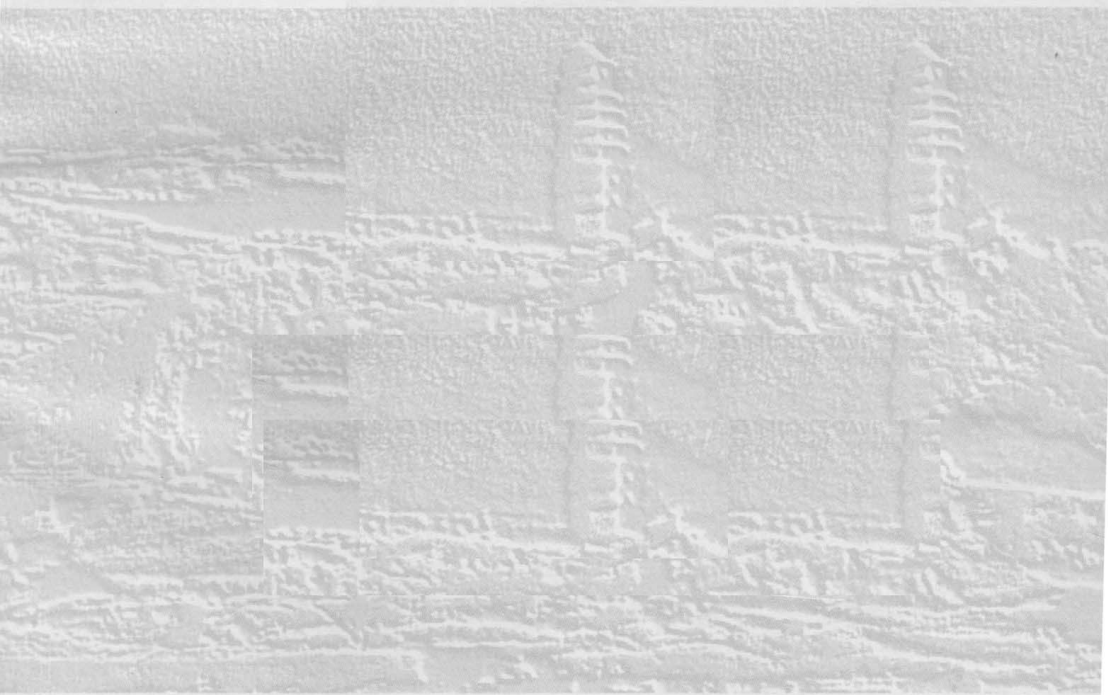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37—1943

③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



D23
185/3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27 年

—— 1 月 ——

1 日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武昌召开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从 1 日起至 12 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武昌召开了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孔庚、孙科、徐谦、钱介磐、董必武、何翼人、李汉俊、陈荫林、周延塘、吴德铎等 15 人为执行委员；董必武、钱介磐、何翼人为常务委员。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此时，湖北省已有 45 个县有国民党组织，党员 3 万多人。到 1927 年 4 月，全省共有县、市党部 74 个，党员发展到 9.4 万余人。

3 日 武汉爆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英帝国主义为保持其在华的特权，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1 月，武汉各界群众自元旦开始，连日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本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演说，英国水兵用刺刀驱赶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 1 人，刺伤群众 30 余人，又制造了“一三”汉口惨案。当时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南洋大楼开会，听取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书记李国焯、湖北省总工会许白昊的报告后，立即决定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并派徐谦、蒋作宾赶往现场，向群众说明政府必当采

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劝群众离开现场，以免发生更大危险。当时正在主持湖北省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等，在得悉惨案消息后，也立即领导全体与会代表声讨英帝国主义这一暴行。当晚，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和湖北省总工会召开武汉工商学界紧急会议，讨论应急办法，决定急电各地报告惨案情况，要求政府对英提出严重抗议。武汉三镇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集中到租界附近，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口号。英领事发现他们已处于中国人民革命风暴包围之中，遂于次日（4日）凌晨2时命令英兵撤到江心军舰之上，并请国民政府派兵进驻英租界。4日上午，在李立三、刘少奇领导下，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对英交涉的6项条件，誓将领导湖北35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中午，武汉工商学各界又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接受工人代表大会提出的6项条件，并做出8项决议，明确提出：请政府向英领事提出严正抗议；令英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将行凶水兵交我政府惩办；撤走驻汉英舰及英租界沙袋电网；撤销英军内河航行权；英领事向我政府道歉；英租界巡捕缴械；由政府管理英租界。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和大力支持下，当日武汉国民政府派4连军队进入英租界。5日，因英帝国主义者指使华捕击伤群众8人，武汉数万群众又包围捕房，驱逐了巡捕。午后，李国焯、李立三等领导群众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30万人示威大会，追悼死难同胞，声讨英国暴行，请政府收回英租界，以杜后患。会后，群众浩浩荡荡进入英租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是日，武汉国民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组成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租界，在租界升起中国的国旗。2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订《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正式将汉口英租界交给武汉国民政府管理。汉口英租界的收回，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5日 蒋介石再次公然挑起迁都之争。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迁都武汉的决议之后，1926年12月31日，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暨何香凝、顾孟余、丁惟汾等抵达南昌。1月1日，当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正式决定以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定名为武汉，准备欢迎滞留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来时，蒋介石为了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却改变了他原先迁都武汉的主张，于1月3日策动在南昌的部分委员举行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并于本日发表通电通知武汉方面，再次公然挑起迁都之争。此后，武汉与南昌方面曾多次发表通电，并派人前往南昌或武汉，劝说对方同意自己的主张。蒋介石也曾一度到武汉，要武汉方面取消联席会议，同意其主张。他甚至还致电共产国际，以要求撤回苏联代表鲍罗廷相要挟。当时，武汉人民正在进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武汉各界人民群众和唐生智、张发奎等军事将领，均反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滞留南昌，而主张迁至武汉。直到1927年2月8日，在南昌方面开会决定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仍迁至武汉；2月21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扩大会议决定，自即日起结束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口正式办公，并决定自3月1日起在汉口召开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后，这一斗争才基本结束。

6日 九江发生“一六”惨案，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收回九江英租界。汉口“一三”惨案的消息传到九江后，本日上午，九江工、农、学各界数万人，在九江总工会委员长彭江和农民协会会长吴九思等组织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声援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当日下午，工人纠察队员吴某阻止英税务司之妻带行李上船，遭洋大班招来的英国水兵殴打致昏倒，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在场其他工人亦有数名被打成重伤。英国水兵的暴行，激起九江民众的无比愤怒。7日，中共九江地委与九江总工会组织数万名群众集会、游行，高呼“收回英租界”、“帝国主义滚出去”等口号，并拥进英租

界，把英领事和水兵赶上英舰。下午，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派兵进入租界维持秩序。同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到九江。8日，邓演达召集九江关监督、各军长官、地方各团体联席会议，讨论善后办法，决定于10月正式组成九江英租界管理委员会，会同军警办理租界内各项事宜，保护租界内中外人士的安全。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在汉口与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签订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双方认可：“关于汉口英租界所订之协定，将即时同样适用于九江英租界。”九江英租界继汉口英租界之后亦被收回。

7日 国民革命军南昌军务善后会议闭幕。本月1日，国民革命军为整编及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等问题，在南昌召开的军务善后会议至本日结束。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朱培德、张发奎、程潜、李宗仁、唐生智等。会议通过了有关编制和作战计划等方案。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是：先攻取杭州、上海，会师南京，彻底消灭孙传芳所部；然后再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合，迫使奉军出关，会师北京。其具体部署是：以主力一部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另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和皖西。对京汉线方面，则由鄂东进入豫南，牵制河南及皖北敌军，策应长江下游作战；同时电告冯玉祥率国民军由陇海路出洛阳、郑州，与豫南北伐军呼应，相机击破吴佩孚在河南之主力。会议对北伐军作战序列重新作了调整，即：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5个纵队（第一、十四、十七、十九、二十六军）；中央军，由蒋介石兼总指挥，下分江右军、江左军，江右军由程潜任总指挥，下辖3个纵队（第六、二军及独立第二师），江左军由李宗仁任总指挥，下辖3个纵队（第七、十、十五军）；西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下辖4个纵队（第八、四、十一、九军）；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总指挥，辖第三军，留驻南昌、九江，准备策应全局作战。

12日 北京政府内阁改组。本日，北京政府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职权名义发布改组内阁命令：任命顾维钧以外交总长兼署国务总理，胡惟德为内务总长，汤尔和为财政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罗文干为司法总长，任可澄为教育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潘复为交通总长。此时，北京内阁已完全为张作霖所控制。

28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革命的军队渐渐接近工人、农民等被压迫民众。“一切帝国主义者更惊慌得发狂起来”，他们除继续利用奉、直等军阀向北伐军及国民军进攻外，便“直接用自己的武装势力”在长江一带示威。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除原驻华海陆军外，现又达成四国出兵协定，大批派遣海陆军来华。帝国主义者“不但用直接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方法，而且还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宣言号召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民众，“扩大巩固我们有组织的力量以拥护帮助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宣言并向国民政府的领袖们提出，不要离开革命，不要离开民众，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雇用的军阀，大胆前进。否则，“若因民众势力之高涨而怀疑、而动摇、而有一点反对工农民众”，必然会走上“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后，许多稳健分子温和派所试探而失败的旧路”。

28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地区执行委员会。1925年秋，中共豫陕区委在河南开封成立，加强了对陕西革命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豫陕区委先后派吴化之、安存真、黄平万、耿炳光等到陕西发展党组织。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1926年6月，中共绥德地委成立，分别统一领导关中和陕北地区党的组织。西安被围期间，党组织与外界失去联系。解围后，成立了党团联系

会议作为全省临时领导机关。1926年年底，中共北方区委向中共中央提议统一陕西党组织。本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委。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耿炳光任书记，魏野畴任宣传部部长，李子洲任组织部部长，亢维恪任农委书记，陈嘉珍任军委书记。后又选候补委员2人。区委工作重心在陕西。

29日 唐生智诱杀黔军总指挥袁祖铭。北伐开始以后，袁祖铭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袁并任两湖战场左翼军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军军长。但他一直蛰居湘西，私委官吏，截留税收，扩充自己的势力，且不遵调遣，拒绝移师鄂西。本日，唐生智密令驻守常德之教导师师长周斓，邀请袁赴宴将袁擒杀，黔军师长何璧辉、朱松等亦被杀。袁军一部分被缴械或收编，一部分退回贵州。2月6日，与袁祖铭关系密切的第九军军长彭汉章亦在汉口被捕，不久在长沙被处决。2月19日，原属第九军的贺龙师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直接受总司令部指挥。

1月 国民党召开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正式成立省党部。1925年9月26日，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等在西安成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党部，以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等9人为执行委员。本月，陕西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正式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共产党员赵宝华、刘含初、杨明轩当选为常务委员，黄平万（兼宣传部部长）、张秉仁（兼组织部部长）、李子洲（兼青年部部长）、张含辉（兼农民部部长）、吴碧云（兼妇女部部长）、王授金（兼工商部部长）、史可轩、魏野畴等当选为执行委员，王尚德、徐九令、呼延震东、熊文涛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至1927年5月底，全省国民党党员发展到2.3万余人，建立县党部21个、市党部1个、临时县党部21个、县党部筹备处25个，各县、市党部主要领导人亦几乎全是共产党员。本月，在西安还成立了全省临时的革命政权——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王天士为总办公室

主任，惠又光、魏野畴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史可轩为政治保卫部部长，段韶九为司法厅厅长，杨明轩为教育厅厅长，郭子兴、葛霁云为民政厅厅正、副厅长，李仪祉为建设厅长，薛笃弼、杨晓初为财经委员会正、副主任，李兴中为参谋长，吴仲旗为秘书长，王尚德为出版局局长。在这些人中亦有不少是共产党人。由于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和革命政权的建立，陕西省很快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

1月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本月，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央政治局多次进行讨论与辩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解释》中第一次明确地承认了中共中央存在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指出这种错误就是死守着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概念，在现实的革命中以此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过。“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解释》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可以“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造成“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环境”。提出党应立即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决议，将这一决议交给全党讨论，并强调了革命领导权和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必将断送国民革命”。这表明，中共中央在十二月特别会议之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又有了变化。正是有了这一变化，才使中共中央在1927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工农运动和反帝反蒋的斗争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1月 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勾结。本月16日，日本外相币原在《对华政策演说》中宣布：“尊重保全中国

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27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声明：“美国一向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并希望在我们对华条约中所规定的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尽早放弃。”29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发表演说：“英国愿变更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中国对外货不能自订税额’和‘外国租界的准独立地位’。”日本还派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日本军部使者铃木贞一，出席北京关税会议，代表佐分利贞男在九江、南昌会见蒋介石，转达日本外相币原、陆相宇垣一成对中国的主张，表示希望蒋能断绝和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在帝国主义诱惑下，蒋介石本月在会见日本领事和使者时，表示将尊重中国与外国订的现有条约，“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愿意同日本握手”，派戴季陶赴日，同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戴于1927年2月14日自沪赴日，至3月31日返回）。他还同意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秘密会谈，表示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温和派”殷切希望汉口事件不在上海重演，愿今后能经常保持联系。蒋介石还两次亲笔致书并派张群至天津邀请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南下。黄曾出任北京军阀政府外交及教育总长，同中国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都有着密切联系，北伐军入赣时，经他穿针引线，中国银行就送了30万现款至江西赣县交与蒋介石。此次黄南下，中国银行又给他一凭信：“在汉口中国银行可以信用透支100万元，供蒋先生饷项。”本月中旬，黄乘船经沪到汉口见蒋，旋即又与蒋一起到南昌、上海。据黄的夫人亦云回忆，此次黄南下，曾向蒋陈述下列谋略：（一）苏联顾问太专制了，共产党太可怕了，“必须离俄清党”。（二）财政方面，必须获得银行界的资助。（三）“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四）在军事方面，若能引阎锡山、冯玉祥为同调，定可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五）一般人“畏惧恐怖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天津租界地产

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已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所以“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重要的事”。这些都被蒋介石采纳了。

—— 2 月 ——

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指挥。1926年12月，阎锡山派代表赵戴文到南昌向蒋介石陈述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军，共谋北伐，并表示一俟冯玉祥部进入河南，山西即发表加入国民革命军之宣言。1926年1月31日，蒋介石正式向国民政府提议，请任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以策应北伐。本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接受蒋的提议，通过决议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指挥。

9日 中共上海地区执行委员会改选。本日，中共上海区委举行全体会议进行改选，选举罗亦农、张佐臣、赵世炎、李震瀛、尹宽、汪寿华、张之甫、谢文锦、郑复他、余立亚、庄文恭、张永和、王亚璋等13人为正式委员；张叔平、余泽鸿、江元青、杨培生、刘尊一、郭持民、王承伟等7人为候补委员。16日，中共上海区委举行改选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罗亦农任区委书记、赵世炎负责组织、汪寿华负责职工、尹宽负责宣传、韩步先任秘书长。会议并决定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由赵世炎兼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为余泽鸿，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为刘尊一（负责知识分子方面工作）、王亚璋（负责女工工作），军事委员会主任为顾顺章，济难委员会主任为王弼，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由罗亦农兼任。会议还提出上海“要有一个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现在局面很紧，要赶快准备。此时，上海中共组织共分闸北、浦东、曹家渡、南市、法租界、杨树浦、小沙渡、引翔港8个部委及上海大学独支和吴淞独支。到3月初，上海的中共党员共3856人。3月7日，上海区委

又决定将上海中共组织划分为闸北（江湾在内）、南市、沪东、沪西、公共租界（沪中）、浦东、法租界、吴淞8个部委。

10日 国民党中央妇女党务训练班开学。这是一所培养妇女与党务人才的学校，1927年1月公开招生，对象是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18至40岁的妇女，共录取103人。其中正取94名，备取9名，有20名上海学员。宋庆龄兼任训练班主任，沈仪彬为教务指导员，陈群为校务管理员。校址设在汉口四维路5号。本日，举行开学典礼，宋庆龄在会上作了《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演说，指出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号召广大妇女为国民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

18日 北伐军占领杭州。按照1927年1月初南昌军事会议的部署，本月1日，北伐军攻克兰溪，2日攻克金华。11日，敌孟昭月亲至富阳督战，分两路在桐庐、诸暨举行反攻。经过5昼夜激战，北伐军再次大败敌军，于16日克富阳、诸暨。孟昭月逃回杭州，勒款300余万北窜。本日，北伐军进占杭州、萧山、临安、余杭。19日，白崇禧率东路军、中路军进驻杭州，周凤岐率右翼军入绍兴。此时，在温台（今温州、临海）之由闽入浙的北伐军及由陈仪旧部编成的第十九军，亦于本月21日入宁波，占领浙东。孙传芳军退至松江、太湖沿岸。3月1日，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开始在杭州执行临时政府的职权。其成员为张静江、周凤岐、韩宝华、陈其采、经亨颐、宣中华、蒋梦麟、蔡元培、褚辅成、戴任、马叙伦等11人，以张静江为主席，张未到任前由蔡元培代理。

2月中旬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到达广州。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罗易被派赴中国，本月中旬到达广州。同行者有谭平山、国际工人代表团英共的汤姆·曼、法共的多里奥特、美共的白劳德和代表团秘书、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人员施脱勒等7人以及和中国赴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的学生43人。

20日 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1926年6月，在黄埔军校和广州农讲所学习的学员，共产党员陈奇涵、萧韶、钟赤心、万川侠、钟友千、陈奇洛、鄢日新、曾新全8人秘密回到江西，在赣南开展农民运动。10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又派黄克、丘倜、舒国藩、李景云、郭家庆等人，以特派员的身份，从广东到江西开展农民运动。北伐军克复南昌后，江西农协组织由秘密转入公开。11月19日，方志敏等在南昌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至本月，全省农协组织已发展到54县，会员达30万人。从本日起至28日，在南昌召开了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1人，郭沫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方志敏作了会务报告，谭延闿作了国民政府报告，赤色农民国际代表达尔汉洛夫作了关于农民国际状况的报告。大会讨论通过惩办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军、清除县政积弊、肃清土匪、取缔高利贷等29个决议案及宣言。选举方志敏、刘一峰、彭震亚、丘倜、王枕心、刘清泉、郭家彬、陆智西、淦克合等13人为省农协执委，黄兑、马维骥、万桂林等3人为省农协候补执委，正式成立了江西省农民协会。在执委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方志敏、陆智西、刘一峰、王枕西和丘倜为常务委员。这次大会促进了江西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6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会员已增加到80万。

22日 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逼近上海，孙传芳部已全线动摇。为保存实力，孙将部队调往江北整编，将沪宁线交奉鲁军驻防。2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再次决定发动工人武装暴动。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和总罢工宣言，提出上海工人政治和经济最低限度要求17条，当天参加罢工工人达15万人以上。20日，中共上海区委发表《告市民书》，号召各界革命的市民“一致起来协同工人奋斗！以打倒统治上海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为奋斗之

最终目的”。并提出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成立上海市民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统一市政以及人民自由权等 12 条政纲。到 22 日，罢工人数达 36 万，中共上海区委发布特别紧急通告，宣布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并通告晚 6 时，以炮击兵工厂、炮击李宝章司令部等地为信号，举行全上海暴动。当晚，“建成”、“建康”两舰按计划准时开炮，各区工人纠察队袭击军警，在闸北、南市并发生了巷战。但因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在罢工之前就在各街市张贴布告，声称对扰乱治安者“格杀勿论”，派出大批军警密布于华界、租界，任意搜查行人，起义总指挥部在起义开始即失去了与各区之联系，当晚将近 11 时，暴动实际上即已失败。23 日，中共中央、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停止暴动。24 日，上海总工会下达复工命令。在这次起义中，工人、学生牺牲 40 多人，被捕 300 多人。

23 日 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到 1927 年 1 月中旬，江西全省工会会员已达 10 余万人，建立了 42 个县、市总工会或筹备处。在工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本日在南昌召开了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140 人。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等决议案和大会宣言与《告工友及各界同胞书》，选出张国、陈赞贤等 9 人为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正式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这次大会，促进了江西省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到 1927 年 4 月上旬，全省工会会员即发展到 20 多万人。

25 日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自南昌发出关于进军上海和南京的电报。本日，加伦致电尼基京并转鲍罗廷、普利契、戈莱斯基、译勃罗夫斯基、齐冈、波洛和沃伊尼奇等苏联顾问，内称：（一）预料北伐军到达上海时，上海工人已宣布进行总罢工，准备发动起义。我们进军上海若迟缓，有使工人受到镇压的危险。我们务必加紧进攻上海。（二）要向白崇禧和其他将军说明，必须乘敌人混乱之机进攻上海。但无论如何不要提出支援罢工这个理由，因为我们

担心他们为了削弱上海工人力量不愿这样做。总司令部将下达这次进攻命令。(三)总的作战计划于两天后下达。总司令部今日决定：白崇禧各部占领上海，同时派部分兵力占领苏州。何应钦各部从杭州地区进攻镇江和南京。第七军和第九军主力（原文如此，似应为第十七军和第十九军。——编者注）调往杭州地区，在宁波地区留一支不大的部队守卫。以后再把这此部队调到上海或南京、镇江。(四)第二军归江右军总指挥程潜辖制，经宁波（似应是“宁国”。——编者注）或广德开往南京。(五)现白崇禧所部正始向苏州和上海进攻，为保障其后方，将第二军部分调往杭州以北广德地区。这就可在初期从宜兴方面保障白所属各部。随着何应钦部抵达杭州地区，敌人向太湖东部发动攻击的危险便可完全消除。正如加伦在电报中所说的，本月27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所部第一、二、三纵队，即第十九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一军一、二、二十一、二十二师等部，循沪杭铁路进攻上海；第二军及第一军第三、第十四师和第十四军（赖世璜部）、第十七军（曹万顺部），经宜兴、溧阳向常州、丹阳前进，并于占领常州、丹阳后，以一部右旋向无锡、苏州进发，协同消灭上海附近之敌，以主力左旋向南京前进，与江右军协同略取南京。但是，当时北伐军到达上海近郊龙华后，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却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加伦上述加紧进攻上海的计划并未能完全实现。

2月 瞿秋白著《第三国际还是零国际——中国革命之孟塞维克主义》。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国共合作以来党的历史，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其阶级关系和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前途与战略策略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内“似无实有之一种主义”——彭述之主义。这种主义，“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表面上只求工人阶级的独立，甚至于高叫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里，同时又说还要准备二次的‘永续革命’，实际上是忽视农民兵士及革命军之作用，抛弃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势不得不

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又误认他是买办阶级，因此不能辨明军阀卖国主义与民族改良主义之区别，只知道谁不向我进攻，即认为革命派而与之联合，其结果纯为与资产阶级联盟之战术计划，于是一切策略错误随之而来，直到卖阶级卖革命而后止。至于党内官僚主义书生主义之组织上宣传上的缺点，尤其是政客主义的投机与流氓主义的纪律，皆含有蔑视群众畏惧群众之心理，抑制实际斗争中之自动创造力，利用落后分子之盲从，凡此一切，皆与彼孟塞维克主义式的战术相仿佛”。此种主义的思想本质，即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的“实验主义”。

瞿秋白之所以把中国革命中这种孟塞维克主义概括为“彭述之主义”，是因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宣传部主任（部长）的彭述之，曾积极宣扬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和主张。他对彭述之的批判，实际上就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他在文章中曾明确提出，中国民主革命“除无产阶级自身而外，只有中国农民及士兵是革命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只有巩固自己“在农民群众中的势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努力发展工农武装和争取革命军队，在统一战线中“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士兵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坚持“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时刻警惕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妥协而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才能取得领导权，“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这篇文章，后来在中共五大时曾印发给到会代表，对人们认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 3 月 ——

3月初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指导工作。针对蒋介石

日益反动的形势，本月初，共产国际在致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曾提出：“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共产党的支部工作”，“在不可能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靠隐蔽的共产党员加紧进行工作”，“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针”。“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不容许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应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必须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者注意，目前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着危急时期，只有在展开群众运动的坚决方针下，革命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会遇到极大的危险”。

4日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湖北的农民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到1927年2月，全省已成立县农协22个，正在筹备的县农协40多个，有组织的农民达81万人。在此期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还成立了农民部，出版了《湖北农民》、《农民画报》等刊物。为总结经验教训，确定农民斗争的计划和策略，从本日起至22日，在武昌召开了湖北省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41县184人。会议由陆沉主持，并聘请徐谦、孙科、顾孟余、毛泽东、林祖涵、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等为名誉主席。本日，会议开幕，武汉各机关团体千余人到会祝贺。大会听取了邓演达的政治报告，陈荫林的省农协会务报告，农民国际代表巴立士的国际农民运动报告，日本劳动团体代表安胜的日本农运状况报告，徐谦的中央农运决议案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乡政、武装、工农商学兵联合、查办土豪劣绅、地租、利率、捐税和没收逆产、省民会议等35个决议案，强调农民协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农民协会作为乡村政权的职能，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大力武装农民。”会议选出陆沉、邓演达、